



谢灵运诗歌的用典特色辨析

吴冠文 陈文彬

摘要:今人多批评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但梳理南朝直至唐代的许多关涉前代诗文用典的文论,对于谢诗用典特色非但未见非议之评,甚至多所称赞。明清论者在涉及谢诗用典问题时,也还是褒多于贬,极少诟病的。这种分歧的产生当主要源于诗歌用典判断标准的时代差异。客观地历史地来考察,谢灵运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不仅在用典的数量上远远少于颜延之等人,其“用人若己”的特色使得他作品中的许多典故常常不易被察觉,更遑论“繁密”了。

关键词:谢灵运;南朝;用典;颜延之

诗文创作中用典(古称用事、事类等)这一修辞表现手法的密集运用是从南朝开始的,因此南朝初期文坛的几位代表人物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等人作品中的用典现象历来备受关注,论者褒贬不一。而这其中最具有争议的应该是对谢灵运诗歌用典是否繁密的评价了。谢灵运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唐宋以后有所式微,但他在南朝却是一直很盛的,这从现存的鲍照、沈约、钟嵘、刘勰、萧子显、萧纲等人的相关文论中均可清晰看出。既然对南朝人用典现象的批评和反思早在刘勰、钟嵘等人的论述中就已存在,那么,在今天很多研究者看来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的缺点,为什么在与他同时和稍后时代的评论者即使在专门批评用典现象时也未予以关注呢?

一、谢诗用典是否繁密的认识差异

今人多认为谢灵运诗歌用典繁密,如有的学者称谢灵运山水诗的缺点之一便是“用典用事过于繁密”^①,或者谓谢灵运山水诗之所以会“给读者一种‘隔’的感觉”,便缘于其间使用了过多的典故^②。还有论者在逐字逐句地统计谢灵运诗歌用典的来源和频率后,通过比较各来源频率的多少,探讨谢灵运诗歌与前代经史子集的承袭关系,得出“整个谢诗……用典的分量确实极多,每首诗里用典的频率极高,而每句里用典的密度也很大”的结论^③。更有甚者,基于对谢灵运诗歌用典的偏颇认识,连《诗品》关于南朝用典密集之风的引领者“颜延、谢庄”的论述,都有人疑为“颜延、谢客”之讹^④。

这种谢诗用典繁密的论断虽然并非始于现当代,如清代陈熙晋已有“颜谢始变清虚,专尚繁密,取材典丽,戕伐无遗也”^⑤的说法。但是,概观明清以来涉及谢灵运诗歌用典的论述,明显以正面评价为主。如明王世懋论道:

①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前言》,台湾里仁书局2004年,第26页。

② 李雁:《谢灵运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③ 李光哲:《谢诗用典之探析》,载宋红:《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

④ 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转引自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⑤ 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卷七《和道士闺情诗启》,清咸丰刻本。

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①便俨然以谢灵运能够融裁《周易》、《庄子》等入诗为古诗创作上的一大进步。而清代的方东树不但以肯定的语气云:“如康乐乃是学者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率意自撰也。”还举出很多具体的例证高度评价了谢诗的用典之妙:

谢诗用事,如“樵隐俱在山”,“妙善冀皆同”……,似此凡数十百处,暂见似白道,而实皆用典。此是一大法门。^②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从明清再往前追溯,唐人对于谢诗用典的认识更是迥异于今人。如被今天的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视作用典范例的,谢诗《初去郡》中的“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无庸方周任,有疾像长卿。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等句,一般认为是在使用历史典故,且是以直接引用伏羲、司马相如等人名的方式出现的^③,以谢灵运十世孙自居的唐代诗僧皎然却一再强调这不属于用典。他在《诗议·论文意》一节中写道:

凡诗者,惟以敌古为上,不以写古为能。立意于众人之先,放词于群才之表,独创虽取,使耳目不接,终患倚傍之手。……若比君于尧、舜,况臣于稷、高,绮里之高逸,於陵之幽贞,褒贬古贤,成当时文意,虽写全章,非用事也。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彭、薛才知耻,贡公不遗荣。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此三例,非用事也。^④

在另一本诗论作品《诗式·语似用事义非用事》条,皎然再次论述道:

如康乐公诗:“彭、薛才知耻,贡公未遗荣。或可优贪竞,未足称达生。”此商榷三贤,虽许其退身,不免遗议,盖康乐欲借此成我诗意,非用事也。

皎然将谢灵运《初去郡》中的这两联归入“语似用事义非用事”之类,意在提醒人们注意:并非诗句中一出现古人名字之类便是用事,也即用典,因为有时作者引入古人名字,只是借评价古人的出处来表现自己,“借此成我诗意”,并非修辞意义上的用典。就如同“古诗:‘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植诗:‘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又古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这些都不是用典。^⑤

其实皎然此处所分辨的乃是“用事”与“比”。在其《诗式·用事》条中论道:

诗人皆以徵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丝”,以“清”比“玉壶”,时人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机诗:“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规谏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诗:“偶与张、酈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详味可知。^⑥

上述评论中皎然首先对当时诗歌评论中“诗人皆以徵古为用事”的看法直接给予了否定。李壮鹰《诗式校注》关于该段文字中陆机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的解释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该段话:“谢灵运诗虽徵古事,但只是为了抒发己志,而以张、酈作比,与陆机的完全叙说古事有本质不同,故皎然谓之‘是比,非用事也’”^⑦。可见,在与皎然同时的许多人眼中,“用事”与“比”已是被混为一谈了,所以他要一再地予以辨析。其实,“比”与用典在今人眼中更是不易辨别,如唐僧齐己撰的《风骚旨格·诗有六义》“三曰比”中,所举杜牧《鹤》诗“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今天一般均会认为“西施”、“四皓”两词是在用典,但皎然、齐己等唐人当会将之排除在用典之外。

仔细体会皎然等人对于“比”和“用事”的论述后可以发现,在他们看来,诗歌创作中并非一出现“徵

①王世懋:《艺圃撷余》,载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501页。

②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31、132页。

③李雁:《谢灵运研究》,第284页。

④皎然:《诗议·论文意》,载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206~207页。

⑤以上并见皎然:《诗式·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载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31页。

⑥皎然:《诗式·用事》,载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30页。

⑦李壮鹰:《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古”的现象便是用典,因为在传统的诗歌六义中,“比”和“兴”都是经常徵用义类相同的物象的,如将君臣分别比作尧舜、稷禹,将思归的人比作胡马、越鸟等。严格说来,这些都不能算作用典,仅可作为“比”。

皎然在辨析用典问题时,常举谢灵运的例子恐怕并非出于对自己祖先的格外袒护,从他上溯至谢灵运逝后不久许多文论中关于用典的论述,在关涉谢灵运及其同时人作品用典的特色评价上,几乎都存在与今人评价分歧较大的情况。如果我们也认为他们的论述有其历史意义,那么对谢灵运诗歌用典的一些具体问题将会作出更加客观的认识。

二、南朝文学用典繁密的始作俑者

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就已提到:“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①到了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则辟专篇对用典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②

这段话几乎是探讨古代文学用典问题者所必引,其含义即刘永济先生所提的:“文家用古事以达今意,后世谓之用典,实乃修辞之法,所以使言简而意赅也。”^③“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④

由挚虞、刘勰的论述可知,在古人眼中,“事类”是成文之“佐”,帮助文章“徵义”、“明理”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古事”和“成辞”。关于用来“徵义”的古事,大家都很清楚,是诸如刘勰所举的“高宗之伐”、“箕子之贞”一类古书所记之事。但是,有关“明理”之“成辞”其范围究竟怎样呢?其实,刘勰所说的“成辞”,并非泛指前人作品中每一个字、词,而是指某一段有意义的言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这段言语可长可短,但一定是蕴含着后人公认的意义,在作为典故使用时,可将其压缩成精炼的词、句(若是原封不动的全引,那又是引述,而非用典了)。如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句,便是将《庄子·山木》中大公任对孔子的一段话压缩成“任公言”和“谢天伐”六字。

谢灵运身后南朝两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心雕龙》虽如上所述有一篇专门谈用典的,但没有涉及刘宋之后作家徵引“事类”的创作实际的。钟嵘《诗品》由于全书体例缘故,未辟专章谈“事类”问题,但却对刘宋之后作家作品中用典情况时有涉及: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寢以成俗。^⑤

钟嵘文中提到的“博古”、“往烈”、“用事”、“故实”、“经史”、“补假”、“新事”等均属与用典相关的一类词语^⑥。在一段议论后,钟嵘对刘宋至其所处时代的文坛用典情况提出批评。在他眼中,用典繁密始于颜延之和谢庄,而非谢灵运。

颜延之的诗歌素以用典繁密著称,这里不再赘述。谢庄的诗歌虽给人“气候清雅”^⑦的印象,但是他素以文名世^⑧。查谢庄《宋孝武帝宣贵妃诔》等文,用典“繁密”之语颇可移来作评——仅诔文短短数句的序中就已典故密布了:

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18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卷八《事类》,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8页。

③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丽辞》,中华书局1962年,第140页。

④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事类》,第146页。

⑤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0~228页。

⑥具体解释可参看曹旭先生《诗品集注》的相关集注。

⑦曹旭:《诗品集注》,第543页。

⑧参见范曄《狱中与诸甥侄书》及《南史·后妃上》与《谢庄传》的相关记载。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贵妃薨。律谷罢暖,龙乡辍晓。照车去魏,联城辞赵。皇帝痛掖殿之既闋,悼泉途之已宫。巡步檐而临蕙路,集重阳而望椒风。呜呼哀哉!天宠方隆,王姬下姻。肃雍揆景,陟岵爰臻。国轸丧淑之伤,家凝陨妣之怨。敢撰德于旂旒,庶图芳于钟万。^①据《文选》李善注,此序除开首交待时间之语,几乎每句文字都有出处。因此,钟嵘《诗品》中“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之语评的当是颜延之的诗、文和谢庄的“随侍应诏一类”^②文。也就是说,在钟嵘眼中,刘宋及其后诗文中用事繁密的典型和始作俑者是颜延之和谢庄,而非谢灵运。

其实不但钟嵘,在谢灵运稍后的鲍照、汤惠休等人眼中,与颜延之相比,也从未因其用典问题引起时人注目。《诗品》谓:“(延之)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③《南史》载:“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④颜延之作品之所以会给人以“错彩镂金”、“铺锦列绣”的感觉,用典过密当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细细体味鲍照、汤惠休及钟嵘的语意,谢灵运不但没有颜延之用典过于“繁密”这一缺点,且与颜诗相较,谢诗给人“芙蓉出水”或“初发芙蓉”般自然的感觉。

三、在颜、谢的比较中看谢诗用典特色

比较谢灵运与颜延之的作品,情况也确实如此。下文即以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与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两诗对照,来看两人诗歌用典特色。之所以选此诗作比,首先是因他们均为应诏之作。一般来说,应诏类作品较少发自内心的切实的感受,多倾向于借重典故来充实诗歌、炫耀才学,因此用典情况就会较突出,从而便于比较;其次,谢、颜此两诗分别作于元嘉四年^⑤和元嘉十年^⑥,作年较近;再次,谢灵运此作十一联,颜延之十三联,篇幅相差也不大。因此,两诗具有较大的可比性。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鸣笳发春渚,税銮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萋绿柳,墟囿散红桃。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顾已枉维縶,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⑦

周御穷辙迹,夏载历山川。蓄轸岂明慙,善游皆圣仙。帝晖膺顺动,清蹕巡广廛。楼观眺丰颖,金驾映松山。飞奔互流缀,缙轂代回环。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开冬眷徂物,残悴盈化先。阳陆团精气,阴谷曳寒烟。攒素既森蔼,积翠亦葱芊。息飧报嘉岁,通急戒无年。温渥浹夷隶,和惠属后筵。观风久有作,陈诗愧未妍。疲弱谢凌遽,取累非繇牵。(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⑧

若据《文选》李善注来统计这两首诗的用典情况,谢诗四处用了典故。即“玉玺戒诚信”句、“昔闻汾水游”句、“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联和“顾已枉维縶,抚志惭场苗”联。其中“昔闻汾水游”句之“汾水游”善注作:“《庄子》曰:‘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顾已枉维縶,抚志惭场苗”善注作:“《毛诗》曰:‘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縶之维之,以永今朝。’”——这两处用典的痕迹很重。“玉玺戒诚信”句,李善注曰:“《邓析子》曰:‘为之符玺以信之。’蔡邕《独断》曰:‘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也。’”——李善为注此句,引了《邓析子》及蔡邕《独断》一文中许多话,这说明了李善也不能肯定谢诗明确地用了哪个典故。其实“玉玺戒诚信”在当时或许已是一句常识性的话,是否存在用典这一修辞手段实在可疑。“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二句也是这种情况。李善注作:“《庄子》:‘舜谓尧曰:‘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司马彪曰:‘言阳光丽天,则无不鉴。’《孝经钩命决》曰:‘地

① 萧统:《文选》卷五十七,影印奎章阁藏六臣注本,韩国1983年,第1379页。

② 曹旭:《诗品集注》,第230页。

③ 曹旭:《诗品集注》,第350页。

④ 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

⑤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第234页。

⑥ 萧统:《文选》卷二十二《应诏观北湖田收》诗题李善注,第531页。

⑦ 萧统:《文选》卷二十二,第525~526页。

⑧ 萧统:《文选》卷二十二,第531~532页。

以舒形，万物咸载。”他这样费力地引了几段话，我们仍是不能确定谢灵运此处是否用了《庄子》的典故。

据李善注，颜诗共十三处用了典故。首句“周御穷辙迹”，善注曰：“《左氏传》：右尹子革对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次句“夏载历山川”，善注曰：“《尚书》：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孔安国曰：‘所载者四，谓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輶、山乘橐。’”——很明显，颜诗首联二句均是用典，均是将原典压缩成五字写出。该诗下面的“帝晖膺顺动”、“清跸巡广廕”、“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开冬眷徂物”、“残悴盈化先”、“息飧报嘉岁”、“通急戒无年”、“观风久有作，陈诗愧未妍”联、“取累非纆牵”等句，由李善注释均可明确其为用典。尤其是其中的“交映溢中天”句，李善作“争光溢中天”，是一句用了两个典故。“争光”，李善注作：“《史记》曰：‘与日月争光可也’。”“中天”，善注作：“《列子》曰：‘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

比较谢灵运、颜延之两人的用典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二。1. 谢灵运诗歌用典在量上远远少于颜延之。2. 谢灵运用典时常能达到刘勰所谓的“用人若己”^①的境界。谢诗的几处用典，除“顾已枉维縶，抚志慚场苗”两句所用典故需在阅读诗歌前了解外，其他三处即使不知道它们原典作什么，也能顺畅地理解诗意。而颜诗则不然，其十几处典故，几乎都要先弄清楚它们的具体含义，才能准确地领会全诗乃至每一诗句的意旨。这里正体现着谢、颜两人创作诗歌时运用材料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对于谢灵运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客观材料，他都是经过一番咀嚼后再将其化成自己的东西，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从《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与原典的关系就可看出，也就是说，经过他消化一番表达出来的东西便都着了他的色彩。而颜延之，虽然他会対原典进行压缩，如将“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压缩成“周御穷辙迹”五字，等等。但一般来说，颜诗压缩原典时，所择字词仍是从原典中来，有时甚至“从原典中截取一两个关键性的有代表性的词，用以概括或代替该典所包含的意思”^②。由于将原典压缩成很少的字，这就可以在一联一句中安排不止一个典故，以至于用典可以很密集。与之相比，谢诗用典并不显得很突出，“繁密”更是谈不上了。

四、“用人若己”的谢诗用典特色

谢灵运诗歌在运用典故时除了常被论及的使用典故的范围扩大到经、史、子、集等特点外，他在典故的具体使用时“用人若己”的特色尤其值得注意，即上文在比较颜、谢时所概括的，有些典故在谢灵运作品中多是以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往往并不遵守原典的字句，使得典故均带上了他特有的色彩。除上文所举《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中例子外，其他的还所在多有。如《富春渚》诗“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两句便是化《庄子》“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意而来，《七里瀨》诗“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两句即是化《乐稽耀嘉》“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③意，等等。清代方东树论道：

康乐固富学术，而于《庄子》郭注及屈子尤熟，其取用多出此。至其调度运用，安章琢句，必殚精苦思，自具炉锤，非若他人掇拾俚钉，苟以充给，客气假象为陈言也。用字如此之确，急宜法。大约谢诗顾题交待，则如发之就带，豪末不差；其成句老重，屹如山岳之奠，不可动摇，取象则如化工。明远逊其度，惠连谢其华，玄晖让其坚，延之比之，如砧硙耳。^④

谢灵运有一些用典非常成功，不着痕迹，虽是前人的事或言，但用在他的诗中，不啻自其口出。王昌龄《诗格·诗有六式》篇《用事五》曰：“谓如己意而与事合”^⑤，所举唯一的例子便是“谢灵运《庐陵王墓诗》：‘洒泪眺连岗’。‘连岗’是诸侯事也。”^⑥王昌龄所举此类例子在谢灵运作品中不胜枚举。谢诗另有些用典巧妙得甚至痕迹全无，让人看不出是在用典。如《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一诗“蹑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悬”联，“心悬”二字乃谢灵运摘取《庄子·杂篇·外物》中“心若悬于天地之间”之关键字而成，郭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540页。

②以上并见谌东飏：《颜诗用典与诗的律化》，载《求索》1994年第6期，第95页。

③按，以上并据萧统：《文选》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大谢》，第146页。

⑤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87页。

⑥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87页。

象注《庄子》此句曰:“所希跂者高而阔也”^①,也就是说心系于外物,总有一些高远的目标想实现。这正是谢灵运对自己希求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入世之心的形容。因此,此处“冷”字便是作谓语动词用,而不是与“心”一起构成“冷心”这一偏正结构式的名词性短语,与有些学者所联想到的唐宋诗词中的“冰心”更无任何关系。这里谢灵运将《庄子》“心若悬于天地之间”句化成“心悬”二字,用进诗中,组成“蹑履梅潭上,冰雪冷心悬”这一联,将自己入世与出世、做官还是退隐这些矛盾的心理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总体上说,谢氏此类不着痕迹以致让读者忽略的用典还所在多有。对于他来说,这种达到了出神入化境地的用典在诗歌创作上无疑是很成功的。他既发挥了诗文用典这一修辞手法的最大效用,即灵活化用自己掌握的经、子、史、集等广博的知识储备,以最少的字句容纳尽量多的意蕴,使诗歌的语言向着更加精炼的方向发展;又在“调度运用,安章琢句”时,“殚精苦思,自具炉锤,非若他人掇拾俚钉,苟以充给,客气假象为陈言也”^②。在诗歌语言和整体风貌上终究呈现出精炼和自然可爱的色彩,而迥异于颜延之等人“错彩镂金”、“雕缛满眼”式的“繁密”面貌。从这个角度反观历代诗论,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南朝直至唐代在关涉谢灵运诗歌用典问题的评价时几乎都是褒扬之声。甚至在考据之风盛行后,清人虽然充分认识到谢灵运诗歌创作中经、子、史、集典故纷纭,比曹植等前人大大扩展了典故的范围,仍然是肯定性的意见居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到了与文言和古典文史知识逐渐隔膜的今人眼中,才越来越觉得谢诗用典具有繁密的缺点。因此,在涉及谢灵运等古代作家创作中用典特色的评价时,用典判断标准的时代差异非常值得我们重新考量和审视。

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llusion in Xie Lingyun's Poetry

Wu Guanwen (Associate researcher, Fudan University)

Chen Wenbin (Associate professor,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Nowadays many scholars think the allusions in Xie Lingyun's poetry are too dense and they are definitely shortcomings. But in investigating criticism about Xie's allusion from Southern dynasties until Tang, only positive commentaries exist. There are still more praise than dispraise as with allusion in Xie Lingyun's poetry until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ivergences in dealing with allusion among ancient and modern criticism may due to the different criteria of poetry allusion at different times. Objectively observe and study, we will find out that there are not only far more less quantity of allusions in Xie's works,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Xie's flexible uses of allusions make them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Key words: Xie Lingyun; Southern dynasties; allusion; Yan Yanzhi

●作者简介:吴冠文,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上海 200433。

陈文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南华真经》卷九,郭象注,《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

②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登江中孤屿》,第146页。